

王殿卿 著

· 寻求中国德育之根

下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寻求中国德育之根

## 下摇卷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求中国德育之根(上下册)/王殿卿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7

ISBN 978-7-206-05732-8

I.寻… II.王… III.德育—研究—中国 IV.G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13099 号

## 寻求中国德育之根(上下册)

著 者:王殿卿

责任编辑:关 静 封面设计:黄 鹤 责任校对:丁志辉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电 话:0431-85378028

印 刷:长春市华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30.75 字数:78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5732-8

版 次:200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 000 册 定 价:60.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自序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20世纪80年代**之初，提出让德育回归到学校教育整体中来，并取代学生政治工作，是教育理论与实践上的一个拨乱反正，这不仅要从根本上转变教育思想，还要承受“淡化政治”的压力；十年之后，到了**90年代**之初，开始进行中华美德教育实验，不仅在认识上被质疑“要用封建糟粕，毒害当代青少年”，而且在理论、资料和师资准备上，几乎是“一片空白”；进入**21世纪**，在开发儒家伦理思想，并进行现代转化，寻求学校德育文化之根的时候，不仅发现自身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国学缺乏根底，而且被人提醒，不要“企图用儒家思想，取代马克思主义”。回顾和总结近三十年的德育研究，我们似乎走过一条这样的路：学生政治工作—学校德育—道德教育—中华美德教育—培育民族精神—弘扬中华文化。这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指引下，寻求建设中国德育之路。

近百年来，具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国，连续成为西方各种教育理论的试验场，几代中国人在这种试验之中生活与成长，中国教育逐渐失去了自身的文化主体性。近三十年来，随着中国逐步发展强大，国际地位步步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先后提出文化建设的新思想与新战略，国人对于中华民族文化，又有了新的认同、自觉和自信。于是，建设中国的教育、中国德育，构建中国教育理论新体系，进而造就新一代中国教育家，也就有了新的愿望和需求。

建设中国德育，建设以道德教育为基础的中国德育，以中华

美德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德育，以中华文化为根基、培育民族精神的中国德育。将新一代中国人培育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合格的中国公民，造就一大批支撑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英，就成为当代教育工作者一项十分沉重的历史责任。

我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参与研究德育，到 90 年代与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的同仁们一道，联络和凝聚了一个志同道合的教育实验团队，在一大批海内外学者的支持下，开始了“大中小学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研究”。并以此为主题，先后承担了国家级和北京市的“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科学规划的重点科研项目。在北京等十一个省市、近千所学校、近百万学生当中进行了连续滚动的中华美德教育实验。为学校从政治教育转向道德教育、中华美德教育，拓展出新的思路。

我们在不断研究与实践的基础上，逐步认识到，文化是民族的生命，道德是文化的灵魂。弘扬中华文化、承接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应当是 21 世纪中国德育的主旋律。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现象，本质上是一种文化现象。优质的文化可以哺育优秀民族，各种文化垃圾拼凑而成的劣质文化，只能引诱新一代国民走向堕落。人是有文化生命的动物，文化生命的结构与质量，决定着人的生命价值。学校不是政治实体和经济实体，它应当是文化实体。学校德育的责任，是提升学生文化生命的质量。当学校成为承传中华民族文化的载体，成为社会文化建设的辐射源，它才是中国的学校，因而才有中国德育。这些思考与研究的过程，就是寻求中国德育之根的过程。从我近三十年的思考与研究成果之中选出百篇文字，编成这部《寻求中国德育之根》。所有文本都是我个人写成的，但它也是参与研究和试验的整个团队心血的结晶，展现了我们探索中国德育的足迹。其中可能有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也为当今中华美德教育的深化研究提供思路、智慧和借鉴。善于以史为鉴，才能事半功倍。

本书的编辑，按照内容归类，依据写作或发表的时间排序。虽然有个框架，但还不是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所有“目”都是一篇独立的文章，原样未改。这可能便于读者了解我的主要观点，却又难免出现某些内容的重复，敬请读者理解，并对其中的不足提出宝贵意见。

在本书出版之际，谨向长期指导我们的专家学者，向长期合作研究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的团队，向支持中华美德教育实验研究的有关省、市、地、县和学校的领导，向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的各位同仁，向吉林人民出版社及其编辑关静女士，向多年来支持我不断奋进的领导、同事和家人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殿卿  
二〇一〇年 源月 愿日  
于首都望京花园



儒学与现代文明

## 读马克斯·韦伯的两本书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和《儒教和道教》札记 1989年 元月 14日

韦伯（1864—1920）是上个世纪后半期至本世纪初期的宗教社会学。宗教本来就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但是，把宗教思想、精神和伦理引向社会，用于社会、影响社会，并导致社会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是韦伯的宗教社会学。他使基督教的新教伦理，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并企图使新教伦理这一资本主义的精神，统治全世界，首先占领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一百年后的今天，历史事实宣告：以韦伯为代表的这种“西方中心论”，是不能左右人类命运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最早发表于1904和1905年，他在1918年去世前作了重要修改后汇成一集，正式出版。他试图从比较的角度，去探讨世界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

他在此书的导论中，从天文学、几何学、自然科学、医学、史学、政治学、法学、艺术、建筑学与建筑艺术、印刷技术、高等教育等方面，对东西方文化进行了对比。其结论是，所有东方的成果，都不如或被西方后来的发展所超过。是一个典型的“西方中心论”代表作。

该书的第二章谈资本主义精神，开头引用了美国早期政治家、科学家、作家富兰克林（1706—1790）在1786年写的《给一个年轻商

人的忠告》和 1764 年写的《给愿意发财致富的人们一些必要提示》中的话：

“切记，时间就是金钱。假如一个人凭自己的劳动一天能挣十先令，那么，如果他这天外出或闲坐半天，即使这期间只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认为这就是他全部的消费；他其实花掉了、或应当说是白扔了另外五个先令。

“切记，信用就是金钱。如果有人把钱借给我，到期之后又不取回，那么，他就是把利息给了我，或者说是把我在这段时间里可用这笔钱获得的利息给了我。

“切记，金钱具有孳生繁衍性。金钱可生金钱，孳生的金钱又可再生，如此生生不已。金钱越多，每次周转再生的钱也就越多。谁若把一口下崽的母猪杀了，实际上就是毁了它一千代。谁若是糟蹋了一个五先令的硬币，实际上就是毁了所有它本来可生出的钱，很可能是几十英镑。

切记下面的格言：善付钱者是别人钱袋的主人。借人的钱到该还的时候一小时也不能多留，否则一次失信，你的朋友钱袋则会永远向你关闭。

“影响信用的事，哪怕十分琐碎也得注意。如果债权人清早五点或晚上八点听到你的锤声，这会使他半年之内感到安心；反之，假如他看见你在该干活的时候玩台球，或在酒馆里，他第二天就会派人前来讨还债务，而且急于一次全部收清。

“行为谨慎还能表明你一直把欠人家的钱记在心上，这样会使你在众人心目中成为一个认真可靠的人，这就又增加了你的信用。

“假如你是一个公认的节俭、诚实的人，你一年虽只有六英镑的收入，却可以使用一百英镑。

“谁若丢失了五先令，实际上丢失的不只是五先令，而是丢失了这五先令在周转中会代来的所有收益，这收益到一个年轻人老了的时候会积成一大笔钱”。

韦伯认为，富兰克林的这些论点，是讲金钱伦理学，伦理成为获

得金钱的手段。“在现代经济制度下，只要能挣钱，只要挣得合法，就是长于、精于某种天职的结果和表现”。

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它是一种对职业活动内容的义务。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伦理的典型体现。它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精神。

德国的费迪南德·古恩伯格，曾经尖刻地讽刺过富兰克林：是要“从牛身上刮油，从人身上刮钱”。

16世纪马丁·路德进行了宗教改革，向中世纪罗马教廷长期经营的宗教秩序挑战。瑞士人加尔文（（1509—1564））以复归《圣经》元精神为宗旨，创立了与罗马天主教相对抗的新教。由于他反对教俗领袖的骄奢淫佚，提倡勤俭节欲以自洁，因此得名“清教徒”。“清教精神”成为资本主的一种思想动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韦伯肯认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性和生成的关系。

韦伯认为，“对财富的贪欲，根本不等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的精神”。因为，“获利的欲望、对盈利、金钱的追求，是尘世间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所共有，它与资本主义不相干”。

按韦伯的观点，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种伦理经济。而且这种经济制度是对一些人的金钱欲望与贪婪的一种限制。

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和《儒教与道教》（1950年）这两部书，是要探讨：中国为什么没有象西方那样实现资本主义？（前书的第15页）在这里他认为，理念与理想并非总是物质环境的反映，它可以成为引发社会经济变迁的真正独立又自发的动力。他认为，西方民族在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而新教伦理不仅和资本主精神有着一种内在的亲合力，而且是导致资本主制度形成的一个活跃的、决定的力量。

新教中的加尔文派信奉上帝预选说，认为人的生死是由上帝永恒的天命所决定的。上帝赐予一部分人永恒的生命，也预先注定了一部



实科中学	逦	獭	怨
理科中学	纒	瀦	苑
中摇摇学	灑	灑	灑
高级市立中学	纒	獭	灑
平摇摇均	灑	灑	灑

这个表中的数字表明：中学里的教徒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比例。前两项之和是占学生总数的 怨缘。这就是说，在未来的劳动大军中有 怨缘的人，要安照上帝的“天职”去劳动和节约。使资本的积累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了全民性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

在今天的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中学、大学有如此雄厚的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基础吗？

韦伯在讲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的作用时，是讲精神促进了物质的发展；在讲儒教与道教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作用时，则是讲精神阻碍了物质的发展。这是讲，中国要发展资本主义，就必须用西方的新教伦理取代东方的儒教和道教，或者用西方的新教伦理改造中国的儒教和道教，或者按照西方的新教伦理对中国的儒教和道教进改革。这就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自从 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文化侵略，在中国到处建立起来的天主教堂，就是这种理论的实践。然而，两个世纪过去了，新教伦理没有取代中国的儒教和道教，中国没有变成西方那样的资本主义。韦伯的理论在中国不适用。近百年来

的东方、尤其是东亚的社会现代化，也历史地宣告了韦伯理论的破产。在西方，韦伯的名字与马克思以及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杜尔凯姆（Emile Durkheim）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被奉为当代社会学的三位神明。

韦伯的思想受到过马克思和尼采的影响。他说过，“谁要是不承认如果没有这两个人，他就不可能在自己的学术领域里做出重要贡献，那么他就是在自欺欺人”他在 1883 年就读于哥廷根大学时，就

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二卷，~~1848~~1849年，他在弗莱堡大学任教期间，阅读了（资本论）第三卷，~~1854~~1855年他阅读了考茨基的《资本论解说》。这已经是 ~~1848~~1849年前的事情了，也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的事情了。如果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算起，至今已有八十余年。那么，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中，有多少人象韦伯那样通读过《资本论》一、二、三卷呢？在今天，如果有人自称是马克思主者，又整天高喊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连《资本论》都没有见过，“那么他也就是在自欺欺人”。高喊马克思主义，而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著作，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走向困境。

如果说，在马克思的思想中有新教伦理的成分，或者说马克思的思想也受到他所生长的那个历史年代，所盛行的新教伦理文化的影响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体系，作为一种继承了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科学思想体系，它在中国的传播，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某些新教伦理与儒教和道教伦理精华的相结合。这种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证明：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使中国革命走向了胜利、使新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进而走上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已经早有定论。但是，除了这三个来源之外，还有没有其它来源？尤其是有没有西方基督教、特别是新教教义中的那些积极的思想成果？这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尽管这是个禁区。马克思对西方的宗教曾经进行过激烈的批判，但是，不能说他没有吸收过西方宗教思想中的精华，否则，就会违背马克思主义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根本原则。中国第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以毛泽东为代表，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也都是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思想文化根基的。他们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也进行过激烈的批判，但是，他们也继承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马克思主义能够被中国人所接受，并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正

说明任何外来的思想文化都要与本民族固有的文化相结合。也只有外来思想文化的精华与本民族固有思想文化的精华相结合，才能产生新的、更加优秀的思想文化。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理论，都是这样整合而成的。

西方对中国进行了上百年的文化侵略，在中国大地上建立了成千上万座天主教堂，给中国派来了成千上万的传教士，企图给中国人的头脑中输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进而“帮助”中国这块殖民地，实现资本主义的市民社会。

据历史记载，在康熙年间，全国有 100 个城市建立了天主教堂，有教徒十几万人。另据不完整的统计，1650 年在华天主教传教士 1000 人，1670 年增至 2000 人，至 1680 年已增至 3000 人，教区有 100 个，教会 100 个，教堂 100 座。

新教传教士自 1601 年马礼逊入广州开始，到 1650 年一共只有 100 人，到了 1680 年增至 200 人，1690 年增至 300 人。

据不完整的统计，从 1600 年 1650 年的 50 年间，中国政府就有 100 次向西方在中国的教会进行“教案培款”。（见《国耻愤》一书第 100 页）

可见，西方殖民主义者，在这方面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之多，他们的目的之“高尚”，以及延续的时间之长，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所无法比拟的。但是，这种文化侵略失败了。其原因之一，就是西方的新教伦理精神，始终没有、也难有可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一部中国近代史证明，任何外来的文化，包括那些有价值的外来文化，如果不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就很难被中国人所接受，就很难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由于韦伯对中国儒教和道教的研究，所以，被西方汉学界誉为中国学研究的“伟大的外行”。

今天来看，韦伯对中国的研究，尽管他的立场是站在西方看东方，以西方的价值标准评判天下的是非，有强烈的西方中心论的历史局限性，但是他的治学的精神和态度、他的一些观点、包括他的错误

结论，也都是值得学习和研究的。

从韦伯这里，可以找到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根据。也可以找到当今美国顽固坚持“美国中心论”的历史依据。还可以找到近百年来，中国人看不起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殖民地意识，一直演变到当今历史虚无主义的思想脉络与渊源。什么时候中国人真正摆脱了“西方中心论”、“美国中心论”的影响，从殖民地意识的精神枷锁下解放出来，中国人才算真正挺直了自己思想文化的脊梁！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才能进入一个历史新阶段。这是中国思想界、教育界面对 20 世纪所应当承担的历史责任。

补充资料：韦伯在《儒教与道教》的第二章自治、法律与资本主义这一章中，他分析了“氏族对经济关系的羁绊”之后，得出一个结论：从纯粹的经济角度而言，一个真正市民的、工商业的资本主义有可能从中国当时的小资本主的萌芽里发展出来的。但是，确实又没有发展出来，“其原因几乎完全在于国家的结构”。

可见，他也把中国近代资本主义未能发展的原因，也归结为封建制度。

# 利玛窦的贡献

## 玛窦来华传教经历简考

今年，澳门即将回归，研究澳门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已经提到日程，而研究利玛窦的贡献，应是此项研究的一个切入点。

基督教文化在中国传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第一次传播是在唐朝“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即~~西元~~西元635年。基督教的聂斯脱利派从波斯到中国传教，被称为景教。

第二次传播是景教在元朝（~~西元~~西元1271）的复兴和罗马天主教来华的传教。其影响只在蒙古族当中，因此，它随着元朝的灭亡而消失。

第三次是明清之际，~~西元~~西元16世纪末到~~西元~~西元17世纪耶稣会士来华传教。

第四次是~~西元~~西元17世纪之后的传教，这是在列强侵华的枪炮声中进行的。

利玛窦来华传教，属于第三次。

~~西元~~西元16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外扩张，是同天主教会的传道结成联盟的。

~~西元~~西元1582年，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来到日本传教，从日本获得了中国文化知识、风俗、习惯。他发现，日本人用中国的经典为依据反对基督教的传播，因为“日本人在智慧和一切知识方面，都尊中国人于首位，无论在宗教上，还是在行政事务上”。于是，他得出结论：基督教必须进攻中国，一旦中国皈依了，日本就会步其后尘。~~西元~~西元1582年他从日本回印度的果阿，中途在中国广东沿海的上川岛逗留，了解

到中国“禁止一切外国人进入”的政策，但是，他不甘心“向中国宣传福音”的企图，回到果阿就制定了在中国传教的计划。1582年11月，他为了执行这一个计划，离开果阿，途径马六甲，历经艰辛到达中国广东上川岛，策划到中国传教的具体行动方案，由于他患了传染病，于当年12月10日病死在上川岛，在他弥留之际，还对着中国大陆绝望地叫喊：“岩石、岩石，你何时才能裂开?!”。他这种不实现向中国传教“死不瞑目”的精神，成为后来利玛窦等耶稣会士们，冒险到中国传教的精神动力。上川岛在当时，是葡萄牙在占领澳门之前的一个与中国之间唯一的贸易点。到1583年葡萄牙人才获得明嘉靖皇帝的批准，在澳门租地建屋的定居点，从此，澳门就成为耶稣会士向中国、日本和东南亚传教的根据地，而16世纪末的耶稣会士，也就成为沟通欧洲与远东文化的桥梁。

后来，利玛窦对这一历史有如下的回忆：“我们耶稣会士依照本会的宗旨，梯山航海……做耶稣的勇兵，替他上阵作战，来征讨这崇拜偶像的中国……发动这场精神战的第一人，便是本会的沙勿略神甫。……以后，耶稣会士们就带着满腔热情，和葡萄牙人结伴而来。……这种冒险事业，经过了种种阻挠之后，……在华的耶稣会长范礼安司铎，决计派几位司铎在澳门学习中文，希望有一天他们能够找到门路进入内地”。

继沙勿略之后，伯来笃、公匝勒、卡内罗、范礼安等传教士，先后到澳门策划对华传教事宜。

1585年，随范礼安从印度出发来华的耶稣会士，有罗明坚、巴范济、利玛窦。他们到了澳门之后，进行了严格的中国语言的训练，同时，先后三次派人到当时的两广总督府肇庆，进行调查并试探开展传教的可能性，终于在1585年12月10日，罗明坚带领利玛窦，取水道沿西江而上，进入了当时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肇庆。他们成功地打开了向中国传播基督教的大门，揭开了明清之际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历史新篇章。

当时肇庆的知府是王泮，祖籍浙江绍兴，是一名学者，在任期间